

# 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 看中美贸易摩擦

□ 姚 洋 邹静娴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 100871

## 一、经常账户格局的重要决定因素： 经济增长差异

在美国挑起的历次贸易战中,美国的长期经常账户逆差往往是美国引爆贸易战的主要原因,同时缩小贸易逆差也成为美国贸易战的一大诉求。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些国家会长期拥有巨额贸易逆差,而一些国家则积累大量贸易顺差呢?

事实上,已有一些学者观察到了经济长期增速与经常账户盈余之间的正向关系(或者是经济增速与资本账户之间的负向关系),这一现象被称为“配置之谜”。之所以称之为“谜”,是因为这与传统教科书的预测不符: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当一国经济增速因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永久性进步而提升时,该国将吸引资本净流入,表现为资本账户顺差(经常账户逆差)。考虑到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应预测应该是经济增速与经常账户呈现负向关系。这一预测确实能在一些发达国家数据中找到部分支持的证据。例如,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前十年的增长速度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同期美国是资本净流入国(经常项目逆差国),而增长较慢的日本和德国则是资本输出国(经常项目顺差国)。但与此同时,珍妮和古兰沙却发现这一预测在发展中国家往往不成立,也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资本不是流向增速较高的国家,而是流向那些增速较低的国家。对应于经常账户余额,即表现为低增长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高增长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对于这一观察到的“配置之谜”,他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给出了一些可能的猜测。

在试图解释这一“配置之谜”时,隐含的前提是传统教科书上的结论是正确的。经济学的结论都是依赖于一系列假设,如果假设变了,结论就可能改变。那么,在相关的传统理论中,最重要的假设是什

么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永久家户假设。在此设定下,不存在任何信息的不确定性,且代表性家户始终延续,使得其一生的预算约束与国家跨期预算约束一致。可见,决策高度准确且理性的代表性家户假设是其模型所得结论的重要支撑。脱离这一设定,可能得到相反结论。事实上,我们曾在世代交叠模型下证明了长期增长越快的国家,在稳态上越可能有经常账户盈余。这一结论可以从“储蓄—投资”缺口的角度来解释经常账户余额:当一国经济增速提高时,由于实际工资的增长会使国民收入增加,并且储蓄率上升;同时,投资率也会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及储蓄率,最终的净效果就是该国经常账户盈余扩大(或逆差缩小)。

按此解释,我们的确能够解释在发展中国家观察到的“配置之谜”现象,但反过来这一解释似乎又和发达国家的一些事实相矛盾。但不要忘了,任何结论都是在“给定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得到的。这里,我们认为有两大重要的“其他条件”会影响结论,即“金融市场效率”和“贸易伙伴国增长速度”。首先,正如卡巴列罗等所指出的那样,一国金融市场越不完善,该国资本越可能流出,表现为资本账户逆差、经常账户顺差。其次,“贸易伙伴国增速”之所以会影响一国经常账户余额,是因为“和谁贸易”是重要的:即便一个国家增长率较高,但如果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增长速度更快,那么该国也可能出现较低的经常账户余额。

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了金融相对差异和贸易伙伴国平均增速后,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表现为高增长国家倾向于有经常账户盈余。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各国反倾销数据,可以看到美国提出的反倾销申诉数与其自身经济增速存在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39$ )。不仅如此,如果以 GDP 增速均值将美国增长率分为“高”与“低”两个增长时期,会发现在低增长时期,其经济增速与贸易摩擦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为 $-0.43$ )在绝

对值上大于高增长期(相关系数为-0.27)。这表明美国频繁提出贸易申诉的时期往往也是其自身增速(相对)放缓时期,并且这种相关性在低增长期更强。回到本文的分析框架,这也与其自身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的经常账户赤字扩大有关。可见,美国的贸易逆差是贸易摩擦的导火索,而这种逆差的根源则是由于美国自身经济增速不及其贸易伙伴国。

除了了解逆差背后的根源外,还应了解为何美国逆差扩大时往往与别国的贸易摩擦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如何看待贸易逆差。虽然众多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经常账户逆差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即便如此,在公共政策讨论中经常账户赤字却总与失业、汇率操纵等问题挂钩。特朗普总统始终认为,美国的逆差意味着就业机会外流,并且这种逆差格局是因为美国遭受了“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导致的。

但事实究竟如何呢?第一,“美国的赤字率上升导致失业率上升”这一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从数据上看,1960—2017年,美国赤字率与失业率的相关系数为负,意味着赤字率上升并没有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从理论上讲,“贸易赤字导致失业”的观点只是一种局部均衡的想法,一般均衡视角下,一些由于进口而损失的工作机会可能会被出口行业工作机会的增加抵消。第二,美国在WTO体制下遭受“不公平”对待的说法也站不住脚:美国尽管在其他国家起诉的案件中败诉率达到89%,但另一重要数据是美国在WTO提交的案件中胜诉率高达91%,表明在美国自己提出的诉讼中很大比例是胜诉的,并不存在“偏袒”之说。此外,WTO规则下的贸易纠纷解决方式虽然存在弊端,但相比于其他贸易争端解决方式仍是较为高效的。有数据表明,美国政府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申诉的贸易壁垒有76%得到解决,而美国通过WTO以外提出的贸易壁垒问题只有近一半得到解决。这说明“按贸易规则”行事对于美国既无歧视,也是客观上较为有效的一种选择。

在美国挑起的数次贸易摩擦中,以1960—1990年的美日贸易战和本轮美中贸易战最为引人注目,这两次贸易战的共同背景都是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通过对日美贸易战的兴起与弱化的问题,有利于理解和预测本次中美贸易战的走势。

日美贸易战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于70年代激化,并于80年代达到高潮,这三个阶段基本与日本制造业的重生、崛起、鼎盛阶段吻合。1970年,日本出口贸易额为190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出口贸易额(432亿美元)的44%。此后十余年,日、美出口贸易额差距不断缩小。1986年,日、美出口贸易额

分别为2108亿美元和2174亿美元,两者已十分接近。据IMF的双边贸易数据库统计,1980年,日本对美国的货物出口占日本总出口额的24.7%,同时占美国总货物进口的12.8%。此后,这两个数据都不断上升,一方面显示日本出口行业越来越依赖美国,另一方面也反映美国的进口越来越依赖日本。1986年,这一趋势达到峰值,当年日本对美国出口金额为819亿美元,占日本出口总额的39.0%,同时在美国总进口比重达到22.2%。此后这两个指标双双回落,1994年,日本对美国出口占日本出口总比重约为30%,在美国总进口比重降至18%以下。这“一升一降”也正好分别对应于美日贸易摩擦的升级与缓和。同时,从美国的出口角度来看,美国对日本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额比重变化不大,始终维持在10%左右。但在美日贸易战的末期还伴随着另一重要事实,那就是从1980年开始,日本的进口中来自美国的进口比重有所上升,直至1987年后基本稳定在23%左右,处于历史较高水平。这两组数据表明:一是美日贸易摩擦是随着日本对美国出口(占美国总进口)比重不断上升而加剧的,也随着这一比重下降而缓解。二是美日贸易战使得日本降低了对美国出口的依赖度,表现为日本对美国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比重的先升后降。三是在美日贸易摩擦的尾声,美国对日本出口(占日本总进口)的比重也保持在一个历史相对较高水平。

此外,还可以从更为宏观的经济增速表现上看日美贸易摩擦。总体而言,日美经济增速表现的变化情况也大致与日美经贸摩擦的节奏吻合: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表现最为亮眼的时期,其GDP增速平均为9.6%。直至70年代中期,日本的GDP增速长期高于美国,1960—1975年日本经济增速平均比美国高出5.8个百分点,这也是日美贸易摩擦触发、激化的时期。大约从1973—1983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日美两国都经历了较为明显的经济增速放缓。但仅用了两年时间,日本就走出了衰退,经济增速从谷底(1974年)时的-2.5%跳升至1976年时的2.9%,同期美国经济增速也从-1.2%上升至4.2%,日美经济增速差距有所缩小。但进入80年代后,美国经济增速再度长期低于日本,1980—1989年,美国和日本GDP增速均值分别为2.0%和3.2%,这一时期也是日美贸易战最为激烈的时期。进入90年代后,日本由于在外部干预下出现了自身政策失误,最终步入“失去的20年”,日美贸易摩擦也随着日本的经济增速走弱而逐步缓解。

此轮中美贸易战在背景上与日美贸易战有类似之处:1980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不足1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比例仅为5.8%。但

此后改革开放激活了市场经济,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也使得中国对美国出口迅速激增。从中国总出口构成来看,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在1992年之前都不超过10%,但之后,这一比例大幅攀升,到1998年时已经超过20%。但此后这一数据基本稳定,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总出口比重为19.0%。相比之下,美国对于中国进口品的依赖度却在稳步上升。以中国对美国出口占美国进口总额比重来看,这一指标从1980年的0.4%跃升至2017年的19.2%,表明美国对于中国的进口依赖度正不断上升。相比之下,在中国的进口品中,来自美国的进口比重却在不断下滑,这一比例从1980年的21.1%下降至2017年的7.8%。在中国进口商品构成中,取代美国的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也是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新格局密切相关的: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扩大与中国对东亚国家逆差的扩大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并且这种同步性主要体现在高级和中级技术商品上。中国通过从东亚国家进口组装件,并代替这些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品,这个过程也被称为“东亚转移效应”,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些东亚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集中表现在中国对美国顺差上。

## 二、发达国家“长期停滞”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

既然长期经济增速是经常账户的决定因素,那么下面两组关于长期增速的基本事实就对于理解当前中美乃至全球的贸易摩擦加剧十分重要。

事实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发达国家为代表表现出的“长期停滞”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虽偶有反弹,但总体处于低迷状态。伴随着全球经济的低增长,是一系列世界经济活动的低水平,可概括为:低投资、低贸易、低资本流动、低通胀、低利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已进入“长期停滞”阶段。“长期停滞”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预测未来全球经常账户格局具有重要预测意义。目前,对于“长期停滞”假说的讨论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展开,但总体而言,普遍认为造成“长期停滞”的原因在于较为长期的基本面原因,因此短期内难有改观。

事实之二,金融危机后各个国家走出衰退的速度各异,从全球格局来看,这意味着未来各国在经济增速表现上将进一步分化,进而导致全球治理格局大变动,这可能是经济增速(相对)变化激化贸易摩擦的另一渠道。

为了考察全球经济排位的变动,把1950—2017年全球所有国家经济增速进行逐年排序,然后计算

出各国相比其上一排序所发生的变动,最后将各国变动的绝对值进行加总。如此一来,就得到了每一年全球增速排序变动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前,全球增速排序变动较为温和;从9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几次大的排序波动。而追溯历史,每一次大的增速排序波动其背后往往是大的经济危机。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马来西亚、泰国、韩国、新加坡的经济增速分别从1996年的7.2%、4.5%、6.6%、3.2%降至1998年的-9.6%、-8.7%、-6.1%、-5.5%,其全球增速排名依次下降了111、125、70和67名。同样,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使各国经济增速排名发生了剧烈波动。

总体而言,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排序上升和下降对于全球排序变动贡献相差不大,不过差别较大的少数年份都是由于排序上升变动超过排序下降变动,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来看,增速排序前进的国家变动超过排序后退的国家。但此番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新现象是,排序后退国家的变动首次超过了排序前进国家的变动,这意味着由于增速放缓导致的排序变动成为全球经济格局变动的主导力量。

综上所述,以长期经济增长的视角来看,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解释过往的贸易摩擦:一是当一国长期增速(相对其贸易伙伴国)放缓时,往往倾向于挑起贸易摩擦;二是当全球经济增速排名发生剧烈变动时,贸易摩擦程度加剧。其中,前者谈的是一国经济增速水平值的变动,强调一国自身发展;后者则是全球经济增速的变动,关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大调整。目前看来,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深陷长期停滞泥潭,并且从长期停滞的成因上看,短期内改善希望不大。但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则相对乐观,这主要源于其相对健康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在技术追赶上的“后发优势”。具体到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如果两国在经济增速上的差异不发生根本性的扭转,那么当前这种经常账户失衡局面就不会彻底改变。

但是,在两种情况下,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可能得以缓解:一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够再次掀起一场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将全球经济引领到一个更快的“全新赛道”。如此一来,各国都可以从新的做大的“蛋糕”中分得一杯羹。尤其是原本已经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还可能迎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结局无疑是皆大欢喜的,但目前来看,似乎尚未出现这样的“技术进步”迹象。中美贸易摩擦缓和的另一种可能就是中美之间经贸联系减弱。尽管这可能无助于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缩小,而仅仅是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可以将贸易摩擦的“火力”分散,有利于缓和中美贸易摩擦。

■ 《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约14000字